

一体化时代的 文学想象

YITIHUASHIDAI
DE WENXUE
XIANGXIANG

张柱林◎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体化时代的 文学想象

YITIHUASHIDAI DE
WENXUE XIANGXIANG

张柱林◎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体化时代的文学想象 / 张柱林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633-8365-8

I. 一… II. 张…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424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西清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6 字数: 200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引言：一体化/差距时代的来临 /1

第一章 再现的困境 /11

第一节 路遥：从政治到经济的无意识转移 /13

第二节 陈应松：如何想象“出路” /32

第三节 阎连科：模仿者的命运 /44

第二章 一体化时代的乡愁 /62

第一节 王安忆：在废墟上回望 /67

第二节 张炜：家园何处 /90

第三章 追寻差异空间 /109

第一节 韩少功：差异的诗学和政治学 /111

第二节 张承志：游牧文学 /128

结语：震惊体验、空间想象与认同 /155

参考文献 /173

后记 /187

引言：一体化/差距时代的来临

从19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技术的越来越发达,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推动的全球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全球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①。西欧最先工业化的国家用战舰、大炮和鸦片等,摧毁或损害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主权、领土完整,使其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人民流离失所,沦为今日的所谓第三世界^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反复强调,现代技术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让世界各国和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现在已经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孤立的状态,资产阶级要榨取全世界的市场,所以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全球化”、“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地方完全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③。中国虽然幸免于完全沦为殖民地,但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挤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追随西方道路的努力又一次次产生更加深重的危机。

虽然中国文明一直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存在不同程度的交流,

① 这个“一体化”在消灭原有的不同体系之间的差异、将其转化为“差距”的同时,又持续制造自己体系之内的差距,关于这后一种差距的扩大,详见下文的分析。

② 有大量的关于现代世界体系形成过程的著作可供参考,如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迟越、王红生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至第三卷,罗荣渠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

③ 情况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以至于农业国需要工业国来提供粮食。见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有大量的关于各地区的不平等的研究,如“依附理论”。

如丝绸之路、佛教东传都是其中的例子,因蒙古帝国的存在而建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圈,更是这种交流的典型,这种交流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彼此之间没有阶序关系。通过中亚的这条道路由于黑死病的大流行而中断,中国后来和西方的联系就主要通过海路了^①。当西方兴起并向世界扩张后,新的世界体系已经产生了质的变化,逐步变成现在的三个世界或四个世界。第四世界是指被现存世界体系抛弃了的世界,这种“第四世界”,不单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可能存在,如美国的印第安人。萨米尔·阿明认为,许多阿拉伯国家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以及部分亚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就是第四世界,这些地区“成为世界一体化的局外人,也就是说他们被排斥在了世界体系之外”^②。中国深深卷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经历了从传统的“朝贡”体系的“帝国”(“天下”)到现代“民族国家”的痛苦转型过程^③。一百多年来,面临重重危机,中国的精英阶层,包括各种统治者和主流知识分子,不管其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如何,都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观点:要与西方抗衡,必须在传统中国的遗产和灰烬中寻找新的强国之路。他们得出的一些基本共识是:必须增强人民的凝聚力,重新组织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① 华勒斯坦(即沃勒斯坦):《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体系》,载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古伟瀛等译,北京,62—63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② 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21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卡斯特认为,“通过高科技网络,全球化把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而摒弃毫无价值的”,而在第四世界中的人,“他们不是被剥削,而是被忽视,这个世界由于太边缘连剥削都不值得”,所以他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过去被剥削的好时光。因为至少剥削是一种社会关系。我为你工作,你剥削我,我很可能恨你,但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所以她才剥削我。这与说‘我不需要你’截然不同。”见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等译,345页,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③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特别是导言部分和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事实值得注意:一是历法改革与公历的使用。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纯粹的自然、物质和客观事实,而是一种“社会事实”,具有“社会功能”^①。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法的国家,而且几千年中只有一门官方的科学,即天文学。传统中国的夏历(1968年“文革”中为了“破四旧”,报刊上开始大规模使用“农历”来取代“夏历”这种称呼)是阴阳合历,而西历是太阳历。崇祯末年已经用西法编定新历,虽因明清易代推迟颁布,到康熙时历法已基本采用西洋新法推订。到1911年清帝逊位,嗣后民国建立,持续了两千多年没有中断的干支纪日法被抛弃^②。中国传统讲究的是,“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没有年号,直接用西历纪年,号为公历。这与之完全背道而驰,意味着“新”的开始,它融特殊性于普遍性的用意昭然若揭。与此同时,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如远洋轮船、火车、飞机和无线电等交往手段的使用,最新的例证是互联网,使空间距离迅速缩小,最后产生了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的状况^④,使中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阶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① 参见埃利亚斯《时间和定时》中的讨论,文载《论文明、知识和权力》(刘佳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等处。哈维在《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一文中说:“空间与时间的社会定义,跟任何个人和制度皆须回应的客观事实的全体力量一起运作。例如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接受时钟时间作为日常生活的客观事实,即使这种时间其实是社会构造物;它提供了共同遵循的标准,不受任何个人的影响,我们不断参照它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并且用它来评估与判断各种社会行为和主观感受。”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的生产》,37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② “根据考证,比较确切地知道,我国从春秋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2年)二月己巳日起,使用于支纪日一直到清代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止,在这二千六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既没有间断又没有发生错乱,这是世界上现今知道的最长的纪日史料。”见张敏、崔振华:《往古今来巧安排》,123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③ 《史记·历书》(第2版),12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④ 见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0—385页等。

另一个情形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急剧扩张,依靠技术、军事力量和政治优势,传播所谓的“普世价值”,使其他地方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遭遇不同程度的打击。中国也不例外,出于应对西方的挑战态势,同时因内部新情况的出现,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价值的颠覆”,其中最重要的是,现代政党政治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1949年后,中国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直至社会公共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推动内部的“一体化”,以便迅速凝聚全国的力量,加速实现现代化。由于冷战的特殊情况,中国采取的是“反西方的西化”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①,初期采取苏联模式,与苏联决裂后试图寻找自己的道路,总的来说是力图成为一种反体系的力量。当然,这种反体系也仍然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给定的“现代化”框架内进行,如强化国家权力机器,重视工业生产,等等,但追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试图在相对公正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②。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向西方经典的现代化道路靠拢,一体化进程加快,经济也迅速发展。但这种高速发展如果没有先前奠定的内部一体化基础是无法解释和不可想

① 余英时对“反西方的西化”有一种看法,说它“是一种矛盾的或‘辩证’的统一;它对中国知识分子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方面‘反西方’可以满足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情绪,另一方面‘西方化’以‘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新面貌出现,又恰好符合‘视西籍若神圣’的潜意识”(见《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和民族认同》,载《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4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这种解释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能自圆其说。

② 这里描述的乃是其理想状态。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情况都走向了设想的反面。和其他时代一样,那时同样存在意识形态宣传与实际操作过程背离的情形。黄宗智认为:“尽管革命的宣传大讲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在具体政策措施上却一直偏重城市和城市居民。国民经济战略投资长期重城市工业、轻农业生产,使得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8页。

象的^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一体化状况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表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目标单一化,国家将主要精力投入经济活动中,人生的价值体现在获得财富的成功上,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新意识形态”^②;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大量涌入中国,同时中国的剩余资本也越来越多地在外国投资,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内部的城乡分治体制开始松动,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城市人口也迅速增多,城市迅速朝扩大其消费功能和服务功能的方向发展。

吊诡的是,正是这种“一体化”加剧了“差距”。“空间和时间的范畴和衡量标准在全球制度化,既增进了‘差异’的意识,又使‘差异’普遍化。”^③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发生在发达的国家和不发达的国家之间,也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暴力斗争层出不穷。那种一体化可以“双赢”的论调如果不

① 如阿马蒂亚·森就曾讨论了中国改革没有预料到的负面影响,如农村医疗保健问题、性别不平衡等,也讨论了计划经济“无意造成的有利后果”,“毛泽东是有意识地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扩展建立基础的吗?(他事实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假设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见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贻、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页。萨米尔·阿明也认为:“如果没有奉行毛泽东思想的30年间打下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很难想象会有近15年的飞速发展。”见其所著《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② 王晓明:《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执政党将精力放在经济上,与之相共生的就是人们重新将价值目标定位在获得财富的“成功”上。将赚钱等于成功,这其实是美国文化的重要主题。见罗伯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271、308—313等页。

③ 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257—25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这里其实已经点出了“差异”的两种不同状态,一种是一体化前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差别很大的兴趣、世界观、财富和权力等,而另一种差距则是一体化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中使用同一种普遍化的衡量标准后,各部分之间形成的财富、权力、文化等的差距、差别。在本书中,一般前一种情况用“差异”,后一种情况用“差距”。

是越来越显得盲目和短视,就是越来越显得虚伪和无情。萨米尔·阿明用两极化的观点分析世界体系时说:“中心从总体上产生了上述体系,同时制造了边缘的次现代性,因为这种世界性的扩张不仅是现代性等级化发展的同义词,它同时还是一个在整体逻辑中功能失常或功能丧失的各部分走向毁灭的过程。所以,边缘化和毁灭是同时存在的。”就此,萨米尔·阿明表明了他的洞见,认为“赶超”意味着要在很大程度上采用资本主义的标准。而“如果东方国家重新联合起来并回到资本主义,它们‘赶超’的步伐并不会加快,恰恰相反,它们将会像所有的边缘国家一样,遭受野蛮资本主义的倒退的影响”,因为“任何边缘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都无法赶超”^①。

这样的当头棒喝并没有引起那些一心奔向美丽新世界的人的关注,中国的各种精英正兴高采烈地为加入一体化的游戏规则(如WTO)而欢呼。可是,就在推动这一进程的人们为自己的胜利庆幸时,当中国的GDP节节攀高时,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的差距却日益加大,中国成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地方

^① 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7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萨米尔·阿明对东欧“社会主义”的看法后来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些力量远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培养资产阶级,因此是在建设资本主义,尽管是在与世界体系的压力相脱离的中央集权经济统制的框架中。……这些体系的崩溃不是民主革命的产物,也不是反革命的产物,而仅仅是它们自然发展的最终阶段。”见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他进而认为,“苏联意识形态本身和它集中于‘赶超(资本主义)’(依我看来,它预示着一个没有资本主义者的资本主义梦想)的经济图景,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变种”。见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而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曾说:“在苏维埃这方面,它保留或毋宁说重新启用了高薪企业家、计件工资、泰勒制、军事和工厂纪律,以及寻求外国资本等等。因此,一言以蔽之,苏维埃不得不再次全盘接收布尔什维克曾当做资产阶级制度与之战斗的全部事物。”见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2页。

之一，以过度开发和损耗自然资源、有意压低劳动力价格为代价，让中国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并且沿海一些地区还成为发达国家倾倒废弃物的垃圾场。

有些学者将这种各部分发展极不平衡的状态视为社会的“断裂”^①，“断裂”所描述的状况与我们所称的“差距”是一样的。在本书中，“一体化”指一个系统、体系或结构内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密、互相依赖的状态，它可以存在于世界范围内，如常说的“全球化”、“全球一体化”等，也可以存在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内部，如欧洲一体化、中国内部的城乡一体化，等等。“差距”则指一个体系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使用同一种普遍化的衡量标准后，各部分之间形成的财富、权力、文化等的差距，也就是体系、结构、系统内的不平等和不平衡状态，可以用断裂、失衡来形容。这两种貌似相反的状态同时共生，是同一个过程的一体两面，本书因此称为“一体

①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另见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吉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关于中国社会的“变局”、“转型”等说法与“断裂”类似，但侧重点各不相同，如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等都曾被视为政治社会或文化上的转型或断裂。唐德刚将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时期均视为一个巨大的转型期的组成部分，主要着眼于制度层面的“国家转型”和社会文化转型。（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也有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切入，如何怀宏将秦汉至晚清的官吏选拔制度称为“选举社会”，而1905年度除科举制，标志着这种社会形态的终结（见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许纪霖也有类似的看法，从知识分子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出发，将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社会称为“断裂社会”。（见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汪曾祺等则认为真正的文化断裂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如他在《谈散文》一文中说：“中国文化有断裂。有人以为‘五四’是一个断裂，有人不同意，以为‘五四’虽是提倡白话文，而文章之道未断，真正的断裂是四十年代。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几乎没有‘美文’，只有政论。”（见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这些断裂的观点是从时间轴上去看的，而现在的断裂是空间性、结构性的。

化/差距时代”。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加入 WTO，“与国际接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的一部分，而在中国内部，“新意识形态”、“超级政府”、“消费社会”等力量与跨国资本结合在一起，将人们的人生理想、政治经济制度、生活条件等一体化和同质化。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分裂状态，利益集团严重分化，各种差距越拉越大，贫富悬殊。这是“一体化/差距”的典型表征。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文学进程，在所谓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大旗下，也表征了对这个一体化过程的想象。本书尤其要关注的是其中一些敏感的作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震惊体验及其表征，探讨他们如何用小说的形式梳理自己的体验，如何理解和表达自己的体验。

由于中国在与现代西方接触前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被视为乡土礼俗社会，而它的现代转型就常常被理解为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立以现代工商业为主的法理社会^①。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农业人口规模庞大，很难短时间内转化成其他产业^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的是苏联模式，让农业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同时，为了加速工业化，又将城市里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乡下。这一充满矛盾的做法是中国的“另类现代性”或者说“反现代的现代性”的表现。地少人多一直是长期困扰中国的问题，可政府居然将几千万无法在城市安置的“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开辟新天地。单是在 1968 年“文革”高潮过后，就有两千万左右的城市知识青年被安置到农村，号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由于当时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尤其是现实的农村和农

① 有关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区别，可参见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在西方的类似讨论不少，所谓“现代化理论”是最新的例子，经典的研究可参见滕尼斯的《共同体和社会》。

② 这个问题即使到现在也仍然是严重的。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民与城市知识青年的想象之间的差距，导致了这些知识青年的震惊。这种客观上为了缩小城乡差别而采取的措施导致了部分知识青年对现实的怀疑，加深了他们的认同危机。这些知识青年中的部分人投入到各种各样的活动中，虽然目的各异，但都试图改变农村，同时改变自己的状况。

在我们讨论的作家中，像张承志，就曾做过民办教师，教授当地牧民识字学文化，韩少功则进了县文化馆。当他们走上文学道路后，一直在反思中国的城乡关系、地区关系、阶层关系，并将其“差异”作为观察中国问题的出发点，同时逐步建立相适应的全球视野。另一种关注同样问题的作家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一般是通过读大学、当兵、招工招干等形式，他们初进城市的时候，也对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感到震惊，像路遥就是典型。这些作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相继走上创作道路后，由于各自的经历不同，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同样的震惊体验在他们的叙述中就呈现了不同的面貌。除了我们选取的七位作家，还有很多作家也同样对一体化/差距时代作出了强烈反应，如王蒙、莫言、李锐、汪曾祺、贾平凹等，但因为这些作家有的作品数量多、内容复杂，有的则与我们讨论的作家有近似之处，或者因篇幅原因，所以并没有在本书中作为例证加以讨论。

本书试图初步勾勒出部分作家在通过小说处理各自面对一体化/差距世界时的震惊体验，特别是其中呈现出来的对世界的洞察、理解和想象的轮廓，爬梳他们的思想脉络，分析他们的美学趣味，尤其是他们的叙述形式后面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当代中国极为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里，一体化/差距如果可以成为一个描述和认识的框架，那就必然会反映在作家的叙事中。通过对当代七位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小说作品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些作家的许多小说作品都是从一体化/差距的角度切入的，而文学批评从这一角度进行的分析研究还不是非常系统和深入。笔者主要是从问题出

发,将叙事看作一种社会象征行为^①,通过所谓“表征的构成主义途径”^②,将符号学分析与话语分析结合起来,研究这些小说作品的表征(再现)实践,分析它们在各种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是如何描述和理解、评价一体化/差距的现实,并提出想象中的解决办法的。这样做,是为了力争避免陷入简单的“题材决定论”或单纯的形式主义分析,试图在强调文学创作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叙事实践的同时,不要掉进将文学创作视为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审美“自律”领域的陷阱中。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② 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第一章 再现的困境

现代生活常常被认为等同于城市生活。古代也有城市,但它主要作为一种行政权力中心在起作用,在人类生活中并没有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古老的农业社会中的农人们随着自然的节奏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刀耕火种,勤劳而悠闲,艰辛而又不失自身的魅力。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相对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逐渐丧失了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和文明,也逐渐丧失了自己祖传的谋生手段,如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的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生产并存、自给自足的局面消失了。现在的情形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都要依赖城市。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和西欧,农民数量很少,但对城市和工业的依赖也特别严重,或者农业本身已经工业化了。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必需品都来自城市和工厂,还得到政府的大量补贴。而在第三世界国家,农民的土地常常被征用,或者被迫改种其他非粮食作物(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名词——经济作物)。

在现代社会中,城市除了它的统治能力得到极大的强化外,城市生活本身也被赋予了先进、文明等价值含义,而乡村生活就被视为落后和愚昧了:“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①对千千万万的人特别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对年轻人来说,从农村来到城市,就意味着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愚昧走向文明、从痛苦走向幸福,这也常常成为文学的一个原型。中国当代的许多作家,也是怀着这样的梦想来到城市的。他们自己,完成了一个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转型,可在他们身后,却留下了无数的农村兄弟姐妹,在时代的洪流中挣扎浮沉。对农村和农民的描述,成为他们作品的主要内容,对农民和农村命运的思考,是他们作品中最重要主题。

第一节 路遥:从政治到经济的无意识转移

今天的主流批评家和文学史研究者已经较少提到路遥了,即使提到,大多也只及于《人生》,很少讨论他自己最重视的作品《平凡的世界》,这与他的作品受到的热烈欢迎形成鲜明的反差^①。但他的作品,特别是《平凡的世界》,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缩小、消除巨大的城乡差距。

在完成一生的主要创作,也就是《平凡的世界》之后,几乎耗尽了整个生命的路遥在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中对自己的创作——不单是《平凡的世界》,其实是一生的创作进行了回顾,他认为自己几乎所有的作品都牵涉到城乡关系:“即如何对待土地——或者说如何对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劳动大众的问题”,他认同通常的看法:“是的,我们最终要彻底改变我国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的生活观念和陈旧习俗,填平城乡之间的沟壑。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正是这样一个

^① 关于《平凡的世界》的畅销与受读者欢迎的情况,以及对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的分析,可以参见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的分析,以及李建军《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载《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